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大政治学评论. 第4辑 / 肖滨 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

(中山大学政治学丛书)

ISBN 978-7-5117-0192-3

I. ①中…

II. ①肖…

III. ①政治学—研究—文集

IV. ①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3593 号

中大政治学评论. 第4辑

出版人 和 龔

策划编辑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李小燕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 录

专栏：反思社会民主主义·····	1
专栏导语 郭忠华·····	3
民主的未来 吉登斯·····	5
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沃尔夫冈·默克尔·····	17
吉登斯对于社会主义的新思考 郭忠华·····	37
民主政治研究·····	48
国家能力与民主质量：一项实证研究 王绍光·····	49
民主的中心偏移 皮埃尔·罗桑瓦隆·····	80
以 PAM 架构论公民治理之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 汪明生 邱靖蓉·····	95
国家能力与地方治理·····	114
强制能力与国家发展——政治学视野中的警察研究综述 樊鹏·····	115
政府强势管制背后的政治文化传统 李永刚·····	148
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公共意识及其对地方治理的挑战——基于 2007 年对 K 省高校教师问卷调查的分析 王金红·····	159
回归自治？回归社会？——居委会改革与直选分析 郭圣莉 杨珊珊 沈天养·····	189
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	209
民族主义的三种导向——从吉登斯民族主义的论述出发 肖滨·····	210
学生与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融合——以“一二·九”运动为转折点 张健·····	227
面对剧烈社会变迁的当代中国社会理论 苏国勋·····	253
书评·····	272
政策争议的欲望战场——《为原罪和疾病卖广告：烟酒营销的政治，1950—199》读后 黎汉基·····	273
把脉中国政治发展 30 年：第四届中国政治发展南北对话会·····	280
中国政治改革 30 年的总体把握李凡姜新立丛日云 朱学勤·····	281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诊断萧功秦郭巍青 张鸣 岳经纶·····	293
地方治理与草根民主 黄卫平 何高潮 胡传胜·····	307

港澳台地方政治发展的分析 蔡子强 邝锦钧 张赞贤·····	314
中国政治发展的展望 马骏 林尚立 肖滨 薄智跃·····	322
稿约·····	331

专栏：反思社会民主主义



■ 专栏导语

主持人：郭忠华

社会民主主义无疑是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自 1899 年伯恩斯坦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至今，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 100 多年的演化历程。100 年来，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思想独立、蓬勃发展、困顿挫折、理念转型、重新执政等一系列过程。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史本身就是西方现代政治史的写照。在 21 世纪的转折时期，社会民主主义在理念转变的基础上在许多西方国家重新登上执政的舞台。为了解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新发展态势，本书特组织“反思社会民主主义”专栏。

在反思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推动社会民主主义转型方面，当代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无疑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这一被誉为“新工党知识领袖”、“布莱尔精神导师”的思想家，不仅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建立了基本的理论框架，而且还促进了社会民主主义新理念在实践中的发展。选入本书的《民主的未来》为 2002 年吉登斯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发表的一次重要演讲。在该演讲中，吉登斯不仅分析了传统民主制度所面临的困难及其原因，而且还提出了促进民主制度转型的新设想：最小限度的民主、权力下放、民主的民主化、超越民族国家层面的民主等等。可以说，本演讲尽管显得短小精悍，但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为读者理解当代民主政治的困境和最新发展趋势提供了思路。

沃尔夫冈·默克尔为德国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 心研究员。选入本书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以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念作为前提，透视第三条道路在主要西欧国家的现实情境，具有明显的

现实色彩。具体地说，此文首先分析了第三条道路的基本理念以及在 20 世纪末西欧的社会背景下，落实这一理念所具有的资源 and 局限。在这一前提下，依次从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社会政策等方面，分析英国的“市场主导模式”、荷兰的“浮地模式”、瑞典的福利制度模式和法国的“国家主义模式”在这些政策上的资源与局限，分析了这些模式的得失。

社会民主主义本身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变体，社会民主主义的重建以对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反思作为前提。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这种认识作为出发点，本专栏选取了郭忠华的《吉登斯对于社会主义的新思考》一文以直面这一问题。该文以吉登斯的思想作为理论蓝本，一方面探讨了吉登斯对传统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总结了吉登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新图景。在此基础上，此文还评价了这一理论图景的得失。

民主的未来

(2002年1月30日)

吉登斯

郭韵译 郭忠华校

安东尼·吉登斯：谢谢各位来到今天的讲座。很高兴看到大家在这里完成了这一年的学业，如果大家听课所获得的乐趣可以达到我讲课所获得的乐趣的一半，我将感到心满意足。今天的讲座继续沿用上几场讲座的形式。首先欢迎今天的讨论嘉宾，威尔·赫顿（Will Hutton）先生，他正谦逊地坐在大家的前面。

听众中的大多数可能对赫顿已经非常熟悉了。他的专栏在《观察家》上长盛不衰，他就如何创造更具有责任感的资本主义等议题撰写了许多颇具深度的文章，这些问题逐步演化成了民主这一主题，这正是我们今天的讲座所要讨论的核心主题。几年前，赫顿曾撰写过一本畅销书《我们所处的国家》（*The State We're in*），该著作主要针对的是英国，并由此推演至西方工业国家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等话题。现在他又在写作另一本书，我想应该快大功告成了，该书认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并非完美无缺，欧洲资本主义更胜一筹，这本书的名字是《我们所处的世界》（*The World We're in*）。

上一场讲座中我谈到了性、两性关系、家庭等，我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政治模式，它们是思考家庭的支配模式，其中之一是“百花齐放”的自由主义模式，在这一模式看来，任何关系都应该被接受和容忍，另一种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家庭已经岌岌可危，我们要回归传统家庭，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根基，等等。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我们不能回归传统的家庭，因为传统家

庭建立在两性关系的基础上，在这种关系中，孩子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不符合国际法框架，也不符合我所描述的现代家庭生活的伦理。但是，我并不认为上次一开始所讲到的同性恋故事是“百花齐放”的一个例子。我所推崇的是这样一种新的家庭生活伦理，它在自由和责任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我们不能让什么“花”都随意绽放，因为我们还必须保护儿童的权利，需要创造一种能够真正带来两性平等的家庭生活。这种伦理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这也代表了我在讲座最后所说的“情感民主”的框架。情感民主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正式政治民主，而是指有效地创造一种以承认平等、参与和交流等伦理为基础的良好关系和强大的家庭。因此，强大的家庭与传统的家庭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我们可以围绕着这些伦理重建家庭生活的结构，我是这么认为的。

很明显，情感民主这一主题与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民主化”密切相关。因此，你们要开始认识到民主这个概念，民主是20世纪到21世纪初期的关键词之一。随着工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展，民主的理念也得到不断扩张，这是过去100多年来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中的关系相当复杂，但民主理念的扩张的确成为过去100多年历史的显著特征。重要的是还必须认识到，民主的扩张并非历来如此。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或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民主的理念和现实实质上是互相抵触的。也就是说，从18世纪一直到20世纪，统治精英们既反对民主的理念，又反对现实的民主制度。民主在当下是一个流行的概念，世界上几乎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得不在名义上承认民主的理念。

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标榜“民主”。有一些国家的确没有标榜，但这种国家绝对为数不多。过去的情况可大不一样。民主的理念和现实要通过争取才能得到，在20世纪的早期，民主只存在于少数工业国家，这些国家在自己的国家里推行民主，却不相信民主可以用于他们所殖民的世界其他地方。正因为这些殖民地缺乏民主的原则，民主在全球社会只是一种局部的现象，甚至到了20世纪20—50年代，工业国家里的民主仍然只延伸到大约一半的人口身上。在大多数主要工业国家，女性直到二战结束以后，即1919—1950年间，才获得投票权。只有在把妇女完全包括进来的条件下，才算得上是一种完整的民主，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世界的其他地方很大程度上依然把妇女排斥在外，直到过去30年左右，局面才有所改变。

好了，民主是什么？在座的诸位政治科学家都知道民主是一个多重的概念，民主和政治理论对它存在着林林总总的解释，民主化也包含了诸多方面。为了简约起见，今天的演讲我将采用我所谓的“最小限度的民主定义”（minimal definition of democracy）来分析民主。“民主”是一种政治体系，具有以下三种特征：首先，该政治体系里有多个而非单一的政党，即政党的多元化；其二，具有开放而自由的选举，人口中具有投票资格的选民都能行使实际的投票权；第三，具有宪法和一套完整的法律来有效地保护完整的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当然，民主的含义远不止于此，但我今天使用的是一种最小限度的民主定义，它使我们可以判定某个政治体系是否民主，但同时你必须认识到民主还具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和复杂性。

如果我们现在用这一最小限度的民主定义分析过去 30 多年来的全球时代——我在这几场讲座中反复强调过这一时代，可以发现，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过去 30 年里，根据最小限度的民主定义，世界的确比过去更加民主了。近期有不少研究都指明了这一现象。例如，于 2000 年初公布的一份主要研究表明，截至 20 世纪末，世界上 192 个国家中已经有 117 个符合我刚才列举的民主化标准，完成了民主化进程。在这一历史时期，被公认为民主化的国家的比重已经比过去上升了两倍。在 2000 年，民主国家的数目比 1970 年上升了三倍。当然，苏联解体和其他变化使世界上国家的数目不断上升，但即使我们不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民主国家的数目还是实现了这一增长幅度。在这一时期，根据刚才提出的最小限度的民主标准加以衡量，大概有 90 个国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到 70 年代早期所公认的威权统治（主要是军事统治）转变成了民主政府。我认为这是一种真实而重要的变化，全球民主化进程是我们必须加以理解的现象，当然，首先必须从不同的量化形式加以理解。我们不清楚这些变化能够持续多久，在这些变化呈逆向发展之前，毕竟要经历民主的循环周期。从拉丁美洲的历史来看，拉美的几个重要国家就经历过民主的周期，这些民主后来被压垮，回归到不同形式的威权统治或者军事独裁。

再来看看今天的阿根廷吧，它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担心它是否能维系民主转型的过程。当然，向民主的过渡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一蹴而就的过程。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些根深蒂固的陋习，例如存在已久的腐败现象，这

一现象长期困扰着阿根廷。我希望阿根廷不会再次陷入威权统治，但没有人能对此作出定论。世界上其他已经向民主转型的国家也会面临着同样的不确定性。然而，这里谈论的不仅是一个周期：我是指相当一部分已经明显地完成了向“大致民主”（close to democracy）或完全民主转型的国家将保持现状，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已经完成的制度变迁是很难被逆转的。例如，拉美的民主主义者在考虑实现从军事或威权统治向民主统治转变的过程中，会参考西班牙、葡萄牙或者希腊的经验，这三个欧洲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就已经开始实现了民主化转型。我想，这三个国家都完成了向民主的清晰转化，并且建立起了民主制度框架，因此很难再回到原来的威权统治，除非它们受到外部世界突如其来的巨大波动的影响。但这还是一个充满了未知数的话题，我们不知道周期的跨度会有多长，也不能肯定真正的结构性转化会前进到何种地步。在我看来，今天的世界社会已出现了一种真正的结构性转变，其原因我将会简略地谈到。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许多国家在民主的边缘挣扎，它们打着民主的标签，却远远没有达到上面提到的民主的最低限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朝鲜都无一例外还处于民主化的进程当中。它们的民主——这里我并没有特指哪个国家——从我们西方世界的角度来看还不能被看做是自由民主，没有满足民主的最低要求。相反，一些政治学家是用“非自由民主国家”来指称它们的。非自由民主是指这些国家正尝试迈向民主，但是困难重重，因为这些国家充满了过去威权统治残留下的种种余孽，如颠覆选举，阻碍公民自由等，这意味着这些国家拥有的更多是民主的空壳，而非真正的民主过程。

如果全球社会发生了结构性转化——因为我认为世界社会的确存在这种转化——那么，发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对此，我将向大家解释（因为 35 分钟的时间限制，我不能详细解释，而只能简要说明）民主扩展的原因。我在这场讲座中分析了这些原因，它们与广泛意义上的全球化影响密切相关。我一再强调过，全球化不仅仅体现在全球市场的扩张上，全球市场扩张甚至不是全球化的主要表现，通信革命才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动力。在今天这个以全球信息社会为主体的世界里，即使是偏远地区的贫苦民众也能进行全球交往。如果你有所怀疑，可以看看阿富汗，在那里的一些地区，70% 的人口——甚至包括阿富汗最穷困的人口——都在收听 BBC 的节目。在信息社会全球化发展的今天，

政府很难再把公民置于被动的地位，更不用说用威权的方式来统治他们了。如果政府不能提升灵活度和公民的参与度，这个国家就会在全球政治和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苏联的威权统治体系曾经在工业社会的演进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全球性知识经济的来临、信息社会的崛起，它马上变得不堪一击。

全球化的扩张与民主的扩张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这绝不是一种简单而粗糙的联系。这种联系相当复杂，而且在世界各个地方，它还受到地方经验、地区冲突以及阴魂不散甚至卷土重来的种种威权统治形式的影响，这些影响与民主政府大唱反调。然而，当我们说全球化与民主存在着密切关联时，我们又面临了一种民主制度的悖论。那就是，当民主在世界各地扩张时，它的腹地似乎正受到破坏，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看起来正体验着民主的危机。在过去 20 年里，政治科学家和普通媒体先后对此进行过广泛的讨论。

为什么人们会认为民主出现了危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在过去 30 年里，政治参与水平在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工业国家都趋于下降。例如，在主要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全国选举、地方选举或者区域选举中，这一时期的投票率已经下降了大约 70%，表明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议题。

我还必须指出，政治参与水平的下降在年青一代中显得尤为突出。你或许从昨天的报纸中已经发现，英国工党正在应对年轻人的政治参与率下降，尤其是党员参与率下降的问题。鼓励年轻人加入工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很高兴地指出，让年轻人加入保守党则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不会挑明保守党的成员所处的主要年龄段，但是他们绝对不是处于风华正茂的时期。

第二，一项有关对政府的信任度（尤其是对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度）的民意调查结果似乎——我用“似乎”一词是因为许多政治科学家对这一结果存在争议——表明，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人们对于政治、民主制度、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度正不断趋于下降。调查还显示，人们极端不信任政治领导人，人们对于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度仅比对记者的信任度略高一点。被调查者中只有 3% 的人相信记者，只有 7% 的人相信政治领导人。

猜猜，如果你去了德国这个完全不同于英国的地方，哪种人的信任度排行

最高？是教授！这在英国完全不一样。但在好几个国家，教授在可信度排行榜中仍然位居前列。因此，对政治领导者的信任似乎出现了整体大幅下滑，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第三，我们有理由去关心民主逆转的原因。这里，我又要提威尔·赫顿先生了。或者至少是因为媒体的崛起而造成了对民主的破坏——威尔，看起来我在针对你，但我在开玩笑，至少不是针对久负盛名的《观察家》——我指的是电子媒体，尤其是电视对政治所带来的影响。

我想现在的媒体，尤其是电子媒体，所扮演的角色远不只是在报道政治动态，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电子媒体定位了政治应该包含什么内容，如果你是一位政治领导人，那么你每天的首要任务就是回应来自媒体的最新问题。同样，你很可能在议会回答问题之前，先对电视或电台节目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你不仅要把对媒体的回答放在政治议程的首位，还要日复一日地这样做，因为媒体对于政治领导者的质疑永远也不会停歇。在我看来，今天，媒体与民主实际上处于一种双重关系中。没有媒体或者没有媒体的繁荣，就不会有民主的扩张。媒体的繁荣，全球通信手段的发展，为民主的扩张创造了条件：没有电视，就没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没有电视，南非的消除种族隔离运动也不会和平圆满地结束。

因此，媒体为政治对话、为公民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和进行更积极的思考开放了广阔的空间。但是，媒体同时也压缩了它们曾经开拓的领域，因为媒体从不间断地把政治议题琐碎化、商业化和个人化，很难让它们长期深入地讨论某一政治议题。我想，如果说我们已经实现了媒体民主，这种说法是合理的，因为媒体已经成为民主机制的核心。但是，我们依然存在充足的理由去担心这样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人恰好看到了这一现象积极的一面，这是很有趣的一面，值得我们思考。有人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种新式的直接民主，而非代议制民主。这就意味政治领导人要一直被公民诘问并对公民负责。正如“媒体”一词本来就含有“媒介”的意思，发挥着中介调解的作用，因此，它似乎比传统的代表制显得更为重要。为此，克林顿政府提出了著名的“电子直接民主”这一概念，它来源于克林顿的主要幕僚之一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他说美国天天都是选举日。如果美国每天都是选举日，这意味着政府每天都要与公民对话。因此，政治领导人可能不关注选举中投票的重要性，而是更关注如

何应对各种持续的挑战。所以，政治领导人和公民似乎每天都在关注民意的走向，并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一种反思性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如果大家愿意，我们可以在讲座的最后再对它进行讨论。

这是否意味着“民主危机”的出现？我想大家对此首先要有几分保留。民主国家存在着各种“结构性张力”（structural strains），这些张力的来源正是同样曾经促成了世界各地的民主，这就是为什么这一问题变得如此棘手和困难的原因。但是，我们必须谨慎，以免对民主的危机或者“政治冷漠”的危机过于泛泛而论。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点：

首先，政治冷漠，尤其是对政治采取“积极的漠不关心”或者积极地忽视国家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看做是民主的主要特征。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一些非民主国家的情况，在那里，人们的生活由国家所支配。东欧国家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对西欧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很难体会，因为故事描绘的场景与他们的实际经历大相径庭，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民主的定义。在民主社会里，如果有人凌晨4点来敲你的门，你会认为是个送牛奶的；但如果在独裁国家，你首先想到的会是特工，而不是送牛奶的。因此，人们所具有的忽视国家的能力、漠视政治的能力是民主社会的关键特征。如果要知道政治参与度在哪些国家最高，非民主国家的数字总是遥遥领先。苏联大多数选举的投票率都高达99%，但我想从本质而言没有人会把苏联定义为一个具有民主政治体系的国家。这个问题很微妙：我们很难说民主的维系与多大比率的政治不参与兼容，但是无疑，民主国家里的人们是可以自由地忽视国家的。威尔比我更加赞同国家，我认为国家经常是公共领域的敌人，国家不总是公共领域的捍卫者，一个国家越是倾向于“不自由”就越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英国上一次大选的数字也很有趣。在2001年的大选中，投票率只有59%。许多人说：这正好表明了政治危机，说明人们越来越疏远于政治。但是，如果我们对事情作更深入的审视，将发现更加微妙和更加复杂的问题。我们对在上次选举中参加和没有参加投票的人进行了有趣的研究。对于工党的支持者来说——我们这里可能也有一些，可能就一两个吧——有趣的是，绝大部分没有参加投票的人都说，如果他们参加了投票，肯定会支持工党。他们没有参加投票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投票的结果已经相当清楚地表现出博弈的态势，尤其是他们所在的选区，所以他们就采取了搭便车的行为，不再费神去投

票了。

更有趣的是伦敦大学学院宪政研究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他们发现，80%没有参加投票的人都非常肯定投票的重要性。换言之，他们不投票并不表示他们不信任民主体系。有些没有投票的人认为自己不投票是一种“积极的不投票”，但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不是非得参加那一次选举投票。

可以总结一下这种发现。在工业国家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研究，它们发现，民众对政治领导人经常非常失望，但却不是对民主本身的失望。在工业化国家，95%的人认为他们会支持民主的原则，也支持发展我先前提到的民主的特征。即使人们对民主的现状有所不满，也不是对民主原则本身的不满。

我们是否有理由担心？是的，我不赞同那些说我们无须担心的言论。我们可以有所作为，可以尝试进行改革。这些改革是什么呢？好，我已经说好了要在20点之前结束我的演讲，我只能简要地概括一下。结束后威尔会对我提问，然后是观众提问的时间。在我看来，我接下来所提出的几种策略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大多数工业国都非常重要。

首先，可以通过还政于民来提升人们对于政治领导者的信任度和民主的参与度。还政于民听起来是一种煽动群众、说说而已的举动，但我指的是权力下放。我在这几场讲座里反复强调，全球化具有双重影响，它既从国家中抽离了一部分权力并把这些权力分散到广泛的全球舞台当中，同时又施加了压力，促使地方自治权力的提高。而权力下放和民主机制的分散化则正确有效地回应了这些变化。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下面的研究提供了例证。刚才提到的那份有趣的调查对世界各地不同的城市和地方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地方选举的投票率可以低至30%，也可以高达80%。它们都是常规性数据，不是偶然的例子。英国的地方选举投票率大约是30%，有时候更低。这一结果表明了什么差异呢？实际上，最主要的差异不在于民主这一抽象的机制在不同地区会如何不同，而是具体到每个地区的政府征税权力的不同。政府征税能力越高，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就越高。原因很明显，投票者大多是理性的人，他们了解得越多，投票的热情就越大。当然，这也会有地方差异。以伦敦为例，我们都知道这里没有真正实现权力下放，无论你怎么评价肯·列文斯通（Ken Lingston）这个人物，他作为市长所拥有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就我个人观点而言，如果英国政府能够有效地给伦敦政府下放更多的权力（比如征税权），伦敦的一些问题，

例如地铁问题和政治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就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因此，权力下放是其中第一个策略。

第二，是我所说的“民主的民主化进程”，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词有点做作和别扭。我所指的是，即使在民主国家，从最小限度的民主定义出发，民主化的水平依然不够高。包括英国在内的大多数民主国家，长期以来充斥着腐败、男性对政治领域的支配等现象。女性虽然可以参加投票，但却没有按照她们应该享有的比率在议会或者其他各种委员会中获得足够的代表席位。在许多政治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久盛不衰的现象，例如老年男性政治人际网络、幕后交易或者用非民主的方式来处理民主事宜等。我想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可以例外。我也认为这些根深蒂固的现象与实际政治参与度密切相关。例如在丹麦，民主化的各项进程非常缓慢，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类似的现象在美国也变得日趋明显，金钱可以购买权力，大财团的集团势力强有力地左右了总统选举和州选举，与此同时，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参与水平也大幅下滑。

第三，民主化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层面，因为现在许多对我们的影响都来自超民族国家的层面。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关于欧盟民主化的讨论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欧盟至少在尝试推行一种超国家层面的治理形式。现在，我们都知道欧盟是不民主的。到访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欧盟不能与自我相抵触（would not get into itself），因为国家加入欧盟的前提为它必须是民主国家，但种种指标显示欧盟是不民主的。因此，民主化还任重道远。但是，欧盟尝试进行的超国家层面的治理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仅如此，欧盟的崛起和其他区域性组织的发展对于成员国内部的民主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以刚才提到过的三个国家为例，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如果它们不加入欧盟，就难以取得经济和政治上的进步。我想，欧盟为这三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衡量欧盟的民主化水平不应该从欧盟机构的民主化程度出发，而要看欧盟在促进其成员国民主进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其中很好的一块试金石当然是看未来三到四年内，即将加入欧盟的十个左右的国家的发展如何。我们必须推进国家层次之上的民主。

好，我所提到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作进一步的阐述，回到我早前提过的，民主的美德之一是它的普通性。弗洛伊德曾说过，心理治疗的首要任务是

把病人高度压抑或高度焦虑的心情转为普通人心情不好的状态。因为这种不好的普通心理是心理患者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治疗效果。如果是这样，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好的进步就是取得普通的、沉闷的民主了。不要认为这种期望值太低，因为对于那些根本没有民主可言的国家来说，这种普通而沉闷的民主也是弥足珍贵的东西。

威尔·赫顿：我想先提几点看法，然后再向安东尼提问。我认为政治参与水平下降的问题比安东尼所说的要更为严重，但还没有造成民主的危机，而是潜在的民主危机。我先就这个问题讲几分钟，然后再请安东尼作出回应。

因为在私人领域之外还存在着公共领域，我将结合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观点，即从相关西方古典哲学传统出发来谈论这个问题。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伟大成就就是催生了民主这一理念，人们开始拥护和支持民主，并把它纳入政治过程当中，民主当时被视为一套重要的公共话语的分支之一。因此对于康德来说，民主是公共领域的一种宣扬形式，他认为在启蒙时代的欧洲，人们可以在公共领域自由地交流信息和思想，而无须受到教会或国家的审查。人们可以发表科学的言论，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宗教出发，人们可以作为自由的男人或女人进行思考而不受限制，可以充分与他人交流，这就是康德所描述的公共领域。

我认为现在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公共领域的分支现在是国家，国家是实现公共领域的庇护者。如果国家的税收得不到保障，我们就没有免费的公共博物馆；如果没有国家，就没有象征着公共性的大学。因此，安东尼刚才说对了，我是赞成国家的，我想国家的公共机构是公共领域的最重要分支，而且是公共领域运转的基本前提。但是，如果国家必须有效，并形成我们所希望的结果，那么，国家的过程就必须是民主的，当然，这是过去 150 年来的一大教训。因此，我对安东尼提出的问题是：

政治参与度之所以下降，人们之所以对政治普遍漠不关心，民主的危机之所以越来越凸显，是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公共领域正面临着威胁，这些威胁来自于国家正逐步被私有化，集团势力日趋强大，被选举出来管理国家的人缺乏信念，他们只能成为别人的傀儡，因此政府运转效率低下，他们应该就此打住。同理，无论是经营铁路、地铁或者是经营一所大学，如果都由私营部门来操纵，公共领域就会被弱化。如果公共领域被削弱，我们作为个人的力量也将